

CHINA
ECONOMICS POLICY

共和国经济 大决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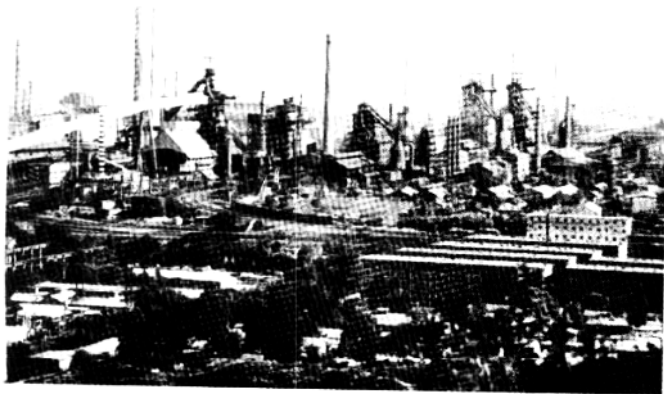
王瑞璞 郭德宏 / 主编
季晓楠 张湛彬

[第三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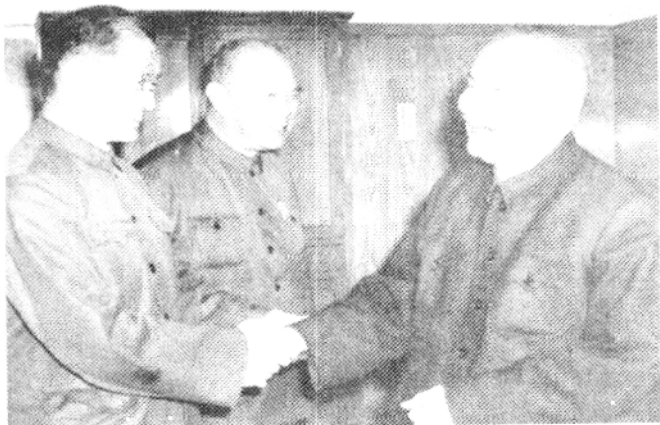




1979年12月6日,邓小平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指出中国本世纪的目标是实现小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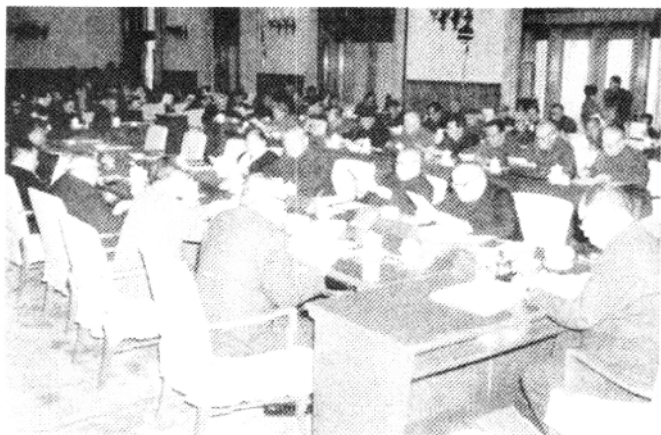
1979年8月,国家经委选择首钢等8家企业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图为首都钢铁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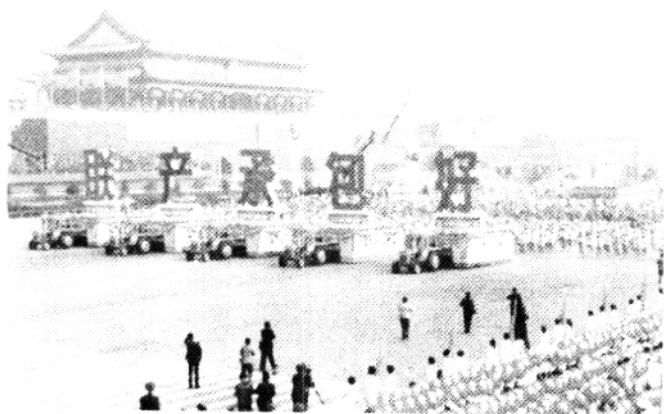
改革开放之初，经济工作千头万绪，陈云提出的“鸟笼经济”理论在这一时期很有影响。图为1982年1月25日，陈云同姚依林、宋平交谈经济工作。



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农业生产责任制，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图为常年缺粮的安徽省凤阳县率先实行这种责任制后，农业生产迅速发展，农民踊跃卖余粮给国家。



1982年3月8日，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决议，同意设立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由时任国务院总理的赵紫阳兼任主任。



1984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五周年的盛大庆典中，北京市郊区农民以“联产承包好”的标语为前导参加游行。



1984年4月,在会见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全体代表后,邓小平同李先念、胡启立、宋任穷等中央领导同志看当天《人民日报》关于经济特区的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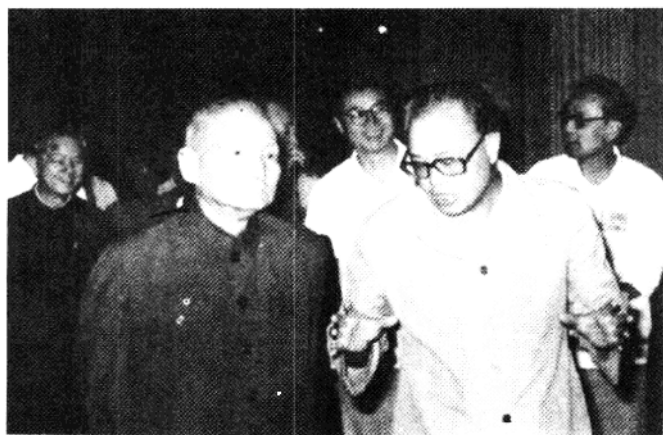
1984年7月16日,国务院决定设立国务院特区办公室。图为当时谷牧副总理在经济特区视察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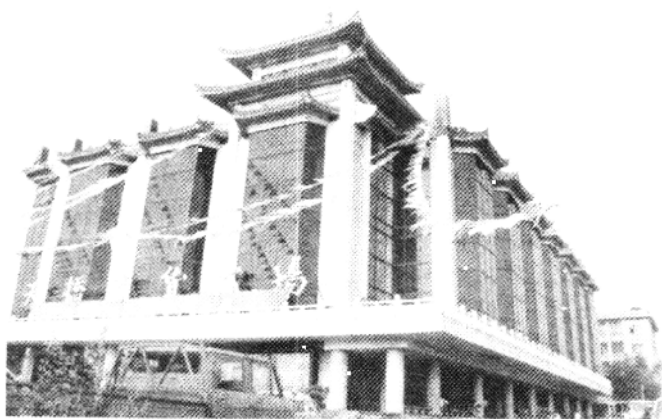
1984年10月20日,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标志着中国全面经济改革时期的到来。图为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会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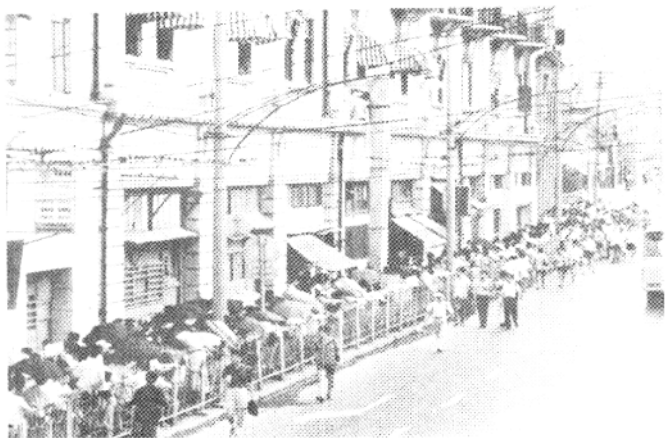
第二汽车制造厂(东风汽车工业公司)是最早试行承包制的大型汽车制造企业。图为邓小平1986年6月初视察东风汽车工业公司。



陈云和赵紫阳(右)一起出席会议。



新中国第一家股份制企业——北京天桥百货股份有限公司,于1984年7月26日诞生,这是我国企业制度改革的一项重大突破。图为改制后的天桥百货商场一期工程。



1986年,上海重开投市。



邓小平和赵紫阳在中共“十三大”主席台上。



1987年11月16日,邓小平对来访的日本社会党委员长土井多贺子说,中共十三大的特点之一,是阐述了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



1988年3月25日,万里和邓小平在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休息室内讨论农村发展问题。

目

3

录

□五个“中央一号文件”诞生的经过	1
□中国经济改革初期的不适应症	15
□“鸟笼经济”	47
□摸着石头过河的城市改革	50
□杀开一条血路创办经济特区	68
□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的产生	91
□“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概念的提出	106
□全面改革时期的纲领性文件	121
□乡镇企业：计划经济的“异军”	156
□发展小城镇的重大意义	173

□关于物价的几个问题	198
□1984年“抢购风”形成的经济原因	208
□邓小平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战略构想	240
□农村土地承包期十五年政策的出台经过	254
□走向企业的“利改税”	263
□解除“统购统销”的枷锁	270
□辉煌的“六五”	278
□一个省级大特区的创办	295
□“洋浦风波”的前前后后	319
□个体户：改革的受益者	334
□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	344
□中国经济改革战略问题的分歧与选择	352
□理论上的突破和实践中的曲折	374
□价格：进一步改革的问题与思路	401
□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经济改革方向	413
□私营经济的再生	429
□中国经济大变动中的双重模式转折现象	454
□社会虚假购买力的形成	468
□继续扩大企业自主权	477

□ 市场调节与政府调节并存的二元机制	488
□ 股份化是社会主义企业的一个新基点	504
□ 企业承包制	510
□ 1988 年中国经济走势	523
□ 双轨制价格改革的历史展现	537
□ 价格改革：经济改革中的一步险棋	552
□ 治理经济环境和整顿经济秩序大决策的形成	573
□ 怎样看待 1988 年的经济整顿	618
□ 十年改革的一个重要教训	658
□ 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战略问题	668
□ 社会公平问题引起国人关注	680
□ 抵制西方大国的“制裁”	691
□ 小岗村农民的不安与江泽民的回应	699
□ 市场疲软是国民经济转向正常状态的前兆	709
□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现状	713
□ 社会主义企业也可以破产	731

五个“中央一号文件”诞生的经过

五个“中央一号文件”是八十年代中、前期(1982年至1986年)中共中央(有的与国务院一起)年年制订、并于每年1月1日(或2日)发布、指导农村工作的五个文件,因其文件编号,正好是中央的每年的第1号文件,故称。

五个“中央一号文件”是指导农村改革取得突破的历史文献。这些文件指导农村改革突破的实质及其中心内容,就是小平同志在1991年底和1992年初南方谈话中所概括的:“搞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废除人民公社制度。”五个“中央一号文件”是邓小平农村改革、发展思想的体现和贯彻。五个“中央一号文件”诞生的过程及其概况如下:

第一个中央一号文件。

制订工作是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后开始的。这次全会于1981年6月27日至29日召开,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毛泽东的是非功过作出了正确结论;并完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班子的建立。全会同意华国锋辞去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和军委主席,新选胡耀邦为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赵紫阳为副主席,邓小平为中央军委主席。这样,新的领导班子紧接着便开始加紧进行农村改革。7月31日胡耀邦批了一期《国内动态清样》给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农委主任万里:“我考虑今年九、十月要再产生个农业问题指示,题目可叫关于搞

好明年农业生产的几个问题。请考虑是否叫农口同志先酝酿一下,如杜(指杜润生)。再下去考察前,也可找他先谈一次。”此前,在7月18日,杜润生曾向万里汇报农村工作,万里也提出:“1980年中央75号文件已被群众实践突破,要考虑制订新的文件”。本来,75号文件是根据小平同志1980年4月2日和5月31日两次肯定“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谈话,于9月14日至22日召开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制订的;在12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小平同志讲话肯定了这个文件的制订。但当时农村改革刚刚开始,“只有三分之一的省干起来”,其它“就有不同意见”,没干,特别是中央领导班子的调整尚未完成,一度《人民日报》和几个省、部门的报刊发表文章批评了“包产到户”(包括《农村工作通讯》、《山西日报》、《大众日报》、《湖南日报》),故文件受到局限。文件讲了“在那些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地区”,“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这一方面是改变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原则通过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中“不许包产到户”的规定;但另一方面似乎文件又限制了非边远山区和非贫困落后地区的“包产到户、包干到户”;不过,从表面上看,文件是只讲了“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地区”;可是,从实质上看,当时农村除少数地区外,大多数地方都是“贫困落后”的(尽管不都是“边远山区”)。据统计,1957年至1977年,我国农民每人每年平均收入从40.5元增加到64.98元,二十年间每个农民总共只增加24.48元,即平均每人每年只增加1.2元。同期,按人口平均占有的粮食产量核算,二十年间平均每人每年只增加0.5公斤。我国农村改革开始时,1978年“农村的大多数地区仍处于贫困状态”。所以,75号文件传达贯彻后,“包产到户、包干到户”迅速在各地发展起来,呈现出强劲的势头,实际上突破了文件。

同时,在杜润生向万里汇报时,万里还给杜润生说:75号文件,有的内容(如说“我国多数地区集体经济是巩固的或比较巩固的”)也给极“左”的人、给不实事求是的人撑了腰;现在农业改革在一些地区要突破人为障碍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

随后,胡耀邦于8月4日找杜润生谈话,布置了文件起草工作,他特别提出了文件要写政策放宽问题。胡耀邦指出:我国农业从1978年以来的好转主要得力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出台的加快农业发展的25条政策,要继续放宽政策。并要求文件能于11月上旬提交中央拟召开的工作会议讨论。

接着,9月上旬,国务院领导布置国家农委召开了安徽、浙江、黑龙江、贵州等省农口负责人和滁县、嘉兴等地区主要负责人参加的座谈会,就文件起草的问题进行了讨论。会上,滁县和农业部的同志曾发生激烈争论。当时,全国各地“包产到户”的队已占32%,争论的焦点是下一步怎么办?一种主张是维持75号文件的框子,不要扩展;一种则主张只要农民愿意,就不要限制其发展。这一争论,涉及的深层次问题是“包产到户”究竟是姓“资”、姓“社”的问题。

然后,中共中央提前于10月4日至21日召开了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各省主管农村工作的负责人参加。中间,中央书记处于10月12日专门接见了会议代表,一起讨论了文件草稿。胡耀邦在讨论中针对“包产到户”究竟姓什么的争论指出:现在有一个问题,文件需要讲清楚。这就是:农村改革、“包产到户”,并未动摇农村集体经济;可是有些干部、群众总是用习惯语言,把改革说成是“分田单干”,这是不正确的,责任制用了“包”字本身,就说明不是“单干”;土地是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坚持土地公有,只是“包”给农民,就不是“分田”,这应向干部和群众进行宣传解释,说明我国农

业坚持土地公有制是长期不变的,建立生产责任制也是长期不变的。最后,文件草稿由各省带了回去,经过省里讨论,再根据各省意见进行了修改定稿,中央政治局于12月21日讨论通过,定名为《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当这个文件在政治局通过后,杜润生当场找了胡耀邦、赵紫阳两人,建议将这个文件能够安排在新年的元旦发出,成为新年的第一号文件,以便全党、全国重视。他们当即表示赞同,胡耀邦随后签发了这个文件。这样,第一个“中央一号文件”便产生了。这个文件的重大意义是初步说明了“包产到户”不姓“资”,并强调了要进一步注重放宽农村政策。文件指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同其它形式的各种农业生产责任制一样,“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它不同于合作化以前的小私有的个体经济”。这比75号文件只讲“可以”在“三靠”生产队搞“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在一般地区”,“就不要搞”的精神完全不同了。农民说这个文件让他们吃了“顺心丸”。

第二个中央一号文件。

1982年1月11日,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胡乔木向杜润生提出:当前农村改革搞责任制,迫切需要从农业合作化理论上有一个很有说服力的材料。1980年的75号文件、1982年的一号文件,都没有从正面在这方面作出肯定的回答,你们要进一步从这方面加强调查、研究。

3月2日中央决定撤销国家农委、成立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后,便由新成立的农研室开始了文件起草的酝酿工作。4月14日,经国务院领导提议,农村政策研究室派出七个由杜润生等农口主要负责人率领的调查组,分赴山东(烟台、德州)、安徽(嘉山)、江苏(无锡)、四川(广汉)、广东(佛山、惠阳、汕头)、广西(梧州)、河北(无极)以及山西、辽宁、吉林等地,分别调查了两个多月

后,于7月7日至14日回到机关作了汇报。另外,由农研室分别于4月15日至16日、5月28日至6月4日、7月15日至24日、8月5日至10日,先后召开了五次农村经济政策研讨会。这些会上,主要研究了“包产到户”后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最突出的问题是如何认识农村新出现的承包大户、雇工、长途贩运、个人购置农机和农副产品加工机具、私人开办公商业、农民外出打工等现象,会上争论热烈,其中的焦点是政策上允许不允许这些农民个体、私营经济的问题。一种意见是,担心放宽这些政策,会引起两极分化,甚至导致资本主义复辟。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允许一定的私营、个体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公有经济的有益补充,可以促进社会生产力加快发展,可以让农民尽快富起来。在此期间,胡耀邦8月5日对陕西养麝困难情况反映材料批示:“总喜欢办农场、吃大锅饭、赔本,为什么不搞专业户或联户养殖”。他8月10日又批示了“要放宽贩运政策”的材料。针对说农民长途贩运是搞投机倒把的“二道贩子”,胡耀邦说:“不对,是二郎神”(解决农村流通困难的“神”)。胡耀邦的批示,对文件起草、酝酿进一步放宽个体、私营经济政策取得共识,起了促进作用。

杜润生先后向胡耀邦等同志汇报了调查和研讨会的情况,他们支持进一步放宽政策。当时,农口有的同志向小平同志写信,不赞成“放宽政策”的提法,邓小平把信转胡耀邦等同志阅处,胡耀邦批给杜润生研究,主张在《人民日报》发文答复,阐明这一提法的必要、正确性,杜润生照办了。

在此期间,针对农民中的消极甚至丑恶现象增多的情况,胡耀邦于7月2日建议中宣部、农研室联合筹备年内召开农民思想政治工作会议,解决农村思想政治工作存在着的涣散软弱状况;8月4日指示农研室研究马列合作制理论;9月1日胡耀邦在党的十二